

零迅身後事

朱正【著】

而已丛书
福建教育出版社

魯迅身後事

朱 正【著】

而已叢書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身后事/朱正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9

(而已丛书)

ISBN 7-5334-4541-4

I. 鲁 II. 朱… III. 鲁迅 (1881~1936) —研
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5153 号

鲁迅身后事

朱正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25592 83726971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rup.com.cn

人民日报社福州印务中心印刷

(福州鼓屏路 33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8.25 印张 226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7-5334-4541-4/K·114 定价: 29.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朱 正 1931年生于湖南长沙。以编辑为职业，业余从事写作。在鲁迅研究方面出版的著作，先后有《鲁迅传略》、《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论集》、《周氏三兄弟》等。杂文集出版有《留一点谜语给你猜》、《思想的风景》、《辫子小脚及其它》、《字纸篓》等。近年来研究范畴扩及当代史方面，著作有《反右派斗争始末》（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和《报人浦熙修》。曾参加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

“而已丛书”十一种

- 《我注鲁迅》 周楠本【著】
《鲁迅回想录》 周楠本【编注】
《鲁迅身后事》 朱 正【著】
《鲁迅笔名索解》 李允经【著】郁重今【印】
《鲁迅杂考》 张 杰【著】
《鲁迅教我》 王得后【著】
《鲁迅古籍藏书漫谈》（上、下卷） 韦 力【著】
《鲁迅评点古今人物》 肖振鸣【编】
《鲁迅评点中外名著》 肖振鸣【编】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王富仁【著】
《鲁迅十讲》 钱理群【著】

丛书策划 / 黄 旭 肖振鸣
丛书责编 / 祝玲凤
特约编辑 / 姚春树
责任编辑 / 林春森
装帧设计 / 小 品
封面图案 / 鲁迅手绘猫头鹰

前 记

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写鲁迅的。这以后的五十年间，我写得多的也还是有关鲁迅的题目。有时候，是自己觉得有些心得想要发表出来；有时候，是有些报刊的编辑先生出了这方面的题目命我作文。总之是写得不少。至今也还在写。

文章写了，总是希望有人看，有人注意的。遗憾的是，看来它并没有起到我希望它起的作用。我不曾奢望在“鲁研界”之外还有读者，可是竟也没有引起“业内”人士的注意。举个例子吧，我曾经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文章，指出1981年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中的问题、缺点乃至错误。有一位记者还因此称我为《鲁迅全集》“最挑剔的读者”。可是看2005年版十八卷本的《鲁迅全集》，就可以发现有许多被指出过的旧版的错误仍旧沿袭了下来，并未改正。就在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到几个这一类的小例。如此说来，我写那些“挑剔”的文字，岂不是白费力气了吗。我想，它对新版《全集》的编者虽然没有能帮上忙，却还是可供新版的读者参考的，因此我想把这些文章再印一次。

鲁博书屋的萧振鸣老板多年来致力于推广发行有关鲁迅的书刊，我的几本小书也承他热心发行，十分可感。现在他受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一部“而已丛书”，邀我加盟，我就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所写的文字里选编了这一本。其中有谈鲁迅的死因的，

有谈假如他还活着会怎样的，所以用《鲁迅身后事》做书名。还有几篇谈鲁迅著作编注出版方面的问题，当然也属于身后事。也有几篇文章谈的是他生前的事，例如同一些人的关系等等。书中最长的一篇谈民权保障同盟，这常常是被鲁迅的传记作者大加强调的题目，可是似乎从来也没有谁真正说清楚过。我呢，当然也没有能够完全弄清楚。在档案公开之前，大约也只能说到这个分寸了。

为了不使这一本过于单薄，我把一些同鲁迅研究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章也编到一块了，希望读者能够接受这个编法。

此次成书，《鲁迅研究月刊》常务副主编周楠本先生帮助我做了许多技术性的工作，谨向他表示谢意。

2006年3月13日朱正于北京

目 录

前记·····	1
鲁迅死因“正、反、合”·····	1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	6
两篇《伤逝》·····	23
“木瓜”其人其事·····	32
回忆文的可信程度·····	39
小人张凤举·····	43
鲁迅与邵洵美·····	47
异中有同·····	58
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	66
《周佛海日记》中的鲁迅兄弟·····	100
邵燕祥与鲁迅文学传统·····	105
读资中筠，想起鲁迅·····	115
一个抄本·····	118
附录：戴文葆《〈为了忘却的记念〉抄后记》·····	121
初版本的特别价值·····	124
删掉的信息·····	129
这叫“审读”吗？·····	132
新版《鲁迅全集》的得失·····	150

“我”是谁?	158
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	161
陈琼芝和《鲁迅全集》	169
贵在新见	175
——读王福湘著《悲壮的历程》	
“政客”这顶帽子	180
丁玲《“开会”之于鲁迅》一文的遭遇	186
隔膜	189
——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	
聂绀弩的“运动档案”	199
为反对而反对	205
——从鲁迅《战略关系》谈起	
关于 1936 年的那次访苏邀请	214
《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部分勘误	221
略谈《胡适全集》第一卷所用的底本和第四卷的校勘问题	
.....	237
《胡适全集》中的重复	251
《胡适全集》中的阙失	260
注释献芹	268
朱自清的一句诗	271
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	274
——介绍《叶圣陶年谱长编》	
一本亲切的人物传记	276
“我首先是个人”	278

鲁迅死因“正、反、合”

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父亲的死”一章中有“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一节，说鲁迅是死于须藤医生的误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许多报刊（包括台湾《传记文学》）纷纷转载，成了读书界的热门话题。

其实这并不是一条新闻。早在1949年周建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这问题提了出来。有这怀疑的还不只是他一个人，许广平也是怀疑的。周海婴在这本书中说：“一直到晚年，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第59页）接着，周海婴还公布了周建人致许广平的一封信，其中说到许怀疑的理由：“老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许广平是每一次诊治都在旁照应的亲属，熟知诊治的全过程，须藤报告中与事实不符之处，她是很容易觉察到的。

须藤的这一篇报告《鲁迅先生病状经过》，作为他写的《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的附录，现在收在北京出版社1999年所出的《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大家很容易看到了。只要拿它同鲁迅日记对照一看，即可发现这篇报告并不是根据每一次诊治的实际病历写成的，而是临到要发表之时编写的，其中有明显作伪的痕迹。这里只举1936年3月28日这一天为例。这一天，须藤的报告说的是：

第一次行穿刺术取胸液，约得三百公分。（第1453页）

而鲁迅日记所记载的是：

晨。上午得增田君信，午后复。寄吴朗西信。下午得唐弢信。得孟十还信。萧军及悄吟来。得《漱石全集》（十三）一本，一元七角。晚蕴如携蕖官来。三弟来。夜小峰夫人来并交小峰信及版税二百，付印证四千。邀萧军、悄吟、蕴如、蕖官、三弟及广平携海婴往丽都影戏院观《绝岛沈珠记》下集。

这里不但没有“行穿刺术取胸液”的记载，连“须藤先生来诊”的记载也没有。而且，在上午下午都排得这样满的日程里，能够在什么时间去做穿刺术，取三百公分胸液呢？这一天的病历岂不显然是伪造的么。

事实上，抽掉肋膜边的积水，是5月31日美国邓医生来诊之后提出的治疗方案。6月15日照的X光片，证实了邓医生的诊断是对的。在这以后须藤才采取这抽胸液的措施。他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却倒填日月，把这时间移前了两三个月，因为这时他已经心中有数，知道自己前一段是误诊了，为了推卸误诊的责任，就写出这样一份真真假假的报告来。

1984年2月22日在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开了一次“读片会”，由上海九所医院的放射科、结核科、胸科专家二十三人来读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的这张X光片。第二天的上海《解放日报》上以《鲁迅先生不是直接死于肺结核病》为题报道了这件事，说：“大家认为鲁迅先生的直接致死原因，是左侧肺大泡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腔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而引起死亡。”这就为了解鲁迅死因提供了确凿无疑的科学证据，可以作结论了。

想不到的是，由此竟引发了一场中日两国间的笔墨官司。有关这一笔墨官司的文献，现在可以在陈漱渝著《鲁迅史实求真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里看到。这本书里在他的《日本读者对于鲁迅死因的看法》一文后面，附录了有关的文章四篇，一是纪维周的《揭开鲁迅死因之谜》，原载1984年5月5日《南京日报·周末》；二是蔡琰的《鲁迅先生并非死于肺病》，原载同年7月21日北京《团结报》；三和四是从日本《朝日新闻》翻译过来的两篇报道。还以题注的形式全文引录了《团结报》在同年8月25日发表陈文时的一则“编者小启”。

“读片会”只分析了病情，并没有提出须藤误诊的问题。而纪维周、蔡琰的文章却是提出了这一点。这两篇文章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

陈漱渝的这篇文章里介绍了泉彪之助和竹内实这两个日本人的反应。医学家泉彪之助为须藤所作的辩白有两条，一是“须藤医生为人温厚笃实，深受鲁迅信赖，也为他故乡的人民敬爱”，二是“鲁迅所患的活动性肺结核和气胸合并症，死亡率目前仍高达百分之二十八点六”。应该指出，这样的辩词是没有说服力的。第一，即使说须藤是个大大的好人，良心大大的好，温厚笃实，深得病家信任，这可以说明他不会做蓄意谋害病人的事，却不能保证他不会偶然也有一次误诊，出一次医疗事故。第二，把这数字计算一下，岂不可说这病的治愈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一.4吗？岂不是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患者可以治愈吗？为什么鲁迅不幸没有能够成为三分之二以上多数中的一人呢？竹内实是著名汉学家，《鲁迅全集》日文译本的编委，据陈文所引，他说的是，鲁迅去世时，中日之间关系紧张，当时有人怀疑须藤医生为鲁迅治病未必是好意，正是险恶的中日关系的反映，算是分析了人们对鲁迅死因表示怀疑的历史原因。对于“读片会”结论所证实的须藤误诊这一事实并未作出辩解，假如他有辩解，我想陈文不会不引吧。

不知道为什么，日本有人不高兴，中国就有人着急了。我猜想，陈漱渝的这篇文章，就是应《团结报》编者的约请而写的。作为一个对鲁迅生平深有研究的专家，他对此事的是非曲直应该是心中有数，所以这篇文章就很不容易写。首先，他说了这次“读片会”是“上海鲁迅纪念馆正常的业务活动”，不是蓄意破坏中日邦交，《解放日报》的文章是“客观报道”，不是造谣惑众。具体到纪、蔡二文，怎么办呢？陈漱渝想出了一个不必由自己出面批判的办法：“笔者于八月二日就鲁迅死因问题询问了鲁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婴，周海婴委托笔者说明：纪维周的文章，对鲁迅的死因进行推测，但未提供任何新的确凿的史料，不能代表中国鲁迅研究界的看法，也不代表他本人的看法。”（第284~285页）该报编者同时刊出的“小启”说前刊蔡文“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发表陈文，是“以正视听”云。

这篇文章只留下一处小小的矛盾。前面说这次读片会“得出了鲁迅先生死于自发性气胸，而不是直接死于肺结核病的新结论”，用了一个“新”字，这个“新结论”，岂不是纪、蔡立论的依据么，后面却说纪文“未提供任何新的确凿的史料”，这两个“新”字就有点互相冲突了。

这篇文章在日本立刻受到了欢迎。日本人做事也真快，就在《团结报》刊出陈文和编者小启的第二天，东京《朝日新闻·朝刊》即以《鲁迅儿子周氏否定鲁迅之死与日本原军医有关的论点》（即陈文之附录三）为题，详细介绍了《团结报》的这两篇。同年9月12日《朝日新闻·夕刊》又报道了《南京日报·周末》批评纪维周文的一则编者按，题为《鲁迅死因之谜的论争可以终止了》，副题是“中国报纸刊登了自我批评”（即陈文之附录四）。日本人鸣金收兵，在这一场笔墨官司中，他们已经大获全胜。此后十余年，无人重提此一公案，真正依了日本人说的“可以终止了”。

没想到，到了2001年周海婴在他的书里把这旧案又翻出来，

比最早周建人的文章，比后来纪维周、蔡琰的文章，都说得更详细，更具体，更有材料，也更无可游移，可见他和十七年前委托陈漱渝表示态度那时，已经大不相同了。到了今天，我想倒可以借用《朝日新闻》的标题：“鲁迅死因之谜的论争可以终止了”。

我想，这本《鲁迅史实求真录》再版的时候，这一篇之末还可以增加一个附录五，即把周海婴此书中的有关段落摘录附上去。

《文汇读书周报》

附记：周海婴的书重新提出鲁迅死因问题，指出了“老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日本关西大学北冈正子教授发表《有关〈上海日报〉记载须藤五百三的〈医学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一文。中译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1期。文章最重要的一个论点是：医生的病历报告和病人的日记不相符的原因是：“有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误将‘五月’写成了‘三月’。”这篇病历报告“如果将三月换成五月的话，有所出入的部分就能得到理解”。

作为对这一论点的答复，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发表了《须藤医生所写鲁迅病历为何与鲁迅日记及书信牴牾的再探讨》一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2期。这篇四千多字的文章用了丰富的材料对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指出：

无论将须藤医生所写《鲁迅先生病状经过》中的“三”月解作“五”月，或是仍作“三”月，都无法改变这份病历自身的破绽。因为，它毕竟存在着编造。而这种编造，正为了事后掩盖医师的误诊及对疾病治疗的延误。

我想像不出还能够出现什么新的辩词。这一争论是不是可以到此为止呢？

2004年5月11日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有人（例如罗稷南）想到鲁迅生前多写批判现实的文字，就在考虑：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不会也被打成右派分子？这问题真不好回答，谁知道假如他活着，在整风鸣放期间是怎样的表现呢？是继续写他的乎？抑一句话也不说乎？不知道。人们不是常常听说“重在表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类宣告吗？一个已经死去二十一年了的人，能有什么表现，能有什么事实呢。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啊。

我们无法知道，要是那时鲁迅还活着，会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或疑似分子。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他的交游中，确实有一些人是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像冯雪峰、丁玲、聂绀弩、黄源、徐懋庸、施蛰存等人，大家都知道，就不用说了。现在就我接触到的材料中再提出十一人，供读者参考。由于我接触到的材料非常有限，这远不是鲁迅交游中的全部右派分子。

陶冶公（1886～1962）名铸，字冶公，后以字行，号望潮。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陶成章的族叔。与鲁迅、周作人兄弟同时在日本留学，又是同乡，就认识了。1907年他邀了六个人从玛理亚孔特夫人学俄文，这六个人是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陈子英、汪公权和他自己。同鲁迅可说是同学的关系。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的时候，陶在北京陆军部参事处为办事员，他们两人每年总要见

一两次面。1929年鲁迅从上海赴北平省母，在北平期间，陶去看望了他，鲁迅也回访了。陶要请鲁迅吃饭，鲁迅回信说：“明日已约定赴北大讲演，后日须赴西山，此后便须南返，盛意只得谨以心领矣。”

陶冶公曾经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代理主任等职。解放后即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陶冶公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11月20日《浙江日报》刊出的民革浙江省委反右派斗争的报道中说：

右派分子杜伟在群众的压力下，他开始向人民交代了他的反动言行，交代出右派集团打击左派、企图夺取民革省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杜伟在交代中说，右派集团的成员有何柱国、叶芳、马文车、江天蔚、陶冶公、王思本、黄云山、项雄霖、张卓如等。

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又字誉虎。广东番禺人。担任过交通总长、交通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鲁迅1930年11月20日的日记记有“寄叶誉虎信”。在这前后没有得叶誉虎信的记载，不知道是为什么事要写信给他。

1957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在9月16日文物界反右派会上的发言，批判了文物界右派分子叶恭绰、宋云彬等人。

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12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共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有：黄琪翔、费孝通、叶恭绰、林汉

达、潘光旦、浦熙修、向达等等。

李小峰（1897～1971）江苏江阴人，出版家。“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为新潮社成员。后参与创办《语丝》周刊。1925年3月，在北京开设北新书局。鲁迅的大部分著译都是在北新书局出版的。1927年北新书局被张作霖封闭，迁移上海后，鲁迅又为北新书局编辑《奔流》文学月刊。后来因为长期拖欠版税，1929年鲁迅曾请律师追索。但在这以后鲁迅仍将所著《三闲集》、《两地书》、《伪自由书》交北新书局出版。他同鲁迅可以说是关系甚深。

解放后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北新书局和另外几家私营出版社合组为上海文化出版社，李小峰也就连人带店进了这个社。后来他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为社里农工民主党支部主任委员。

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记者习平、季音合写的报道《从一个支部看农工民主党右派的反动路线》，一开头就说：“上海文化出版社农工民主党支部，是农工民主党组织中忠实执行章伯钧反动路线的基层支部之一。”这篇报道说：“去年12月，文化出版社的共产党支部召开了一个民主党派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但这些野心家们不同意‘民主党派座谈会’的名称，要改为‘党派联席会’，意思就是他们与共产党应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农工支部主任委员李小峰说得更明白：‘互相监督首先是监督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行动多，容易犯错误。’”

这篇报道还说到了右派分子许君远，说“他又积极鼓动别人离开文化出版社，去搞所谓‘同人出版社’、‘专家出版社’，鼓动曹冰严恢复广益书店，鼓动李小峰去恢复北新书店，甚至已拟出了同人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名单”。

王捷三（1899～1966）陕西韩城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